

第 17 卷 第 4 期 2024 年 12 月

( 本期选译自美国波士顿学院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umber 118, Boston College )

# 国际高等教育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主办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第 17 卷第 4 期 2024 年 12 月

Vol. 17, No. 4, December, 2024

# 国际高等教育

学术星球大战：亚洲和欧洲的卓越计划 .....	1
高等教育的全球趋势与地方政策 .....	4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与未来：第六版国际大学协会全球调查分析纳 .....	6
高等教育中的心理健康危机：来自新加坡的洞察 .....	9
美国学生贷款债务危机及其长期经济影响 .....	12
国际危机时期的高等教育融资：澳大利亚的例外 .....	14
基于收入的学生贷款债务对英国毕业生生活的影响 .....	16
基于绩效的大学资助：欧洲过去与现在 .....	19
成本与公平：解读肯尼亚大学融资改革 .....	21
更高的学位还是更高的抱负？英国艺术与人文学科博士的新路径 .....	23
博士政策治理的演变：国际组织影响力的发展 .....	26
国际学生流动、机会与迁移的自愿性：一种新的概念性方法 .....	29
新冠疫情后日本和韩国的国际学生政策 .....	32
中国学术人员制度改革：轨迹与矛盾 .....	35
前苏联国家大学治理的背景 .....	37
法国：“大学院”与“大学”之间的分界即将消失吗？ .....	40
高校学生学术诚信问题的成因与应对：基于俄罗斯和乌克兰高校的调查研究 .....	42



## 学术星球大战：亚洲和欧洲的卓越计划

贾米尔·萨尔米、菲利普·G·阿特巴赫、玛丽亚·尤德科维奇

贾米尔·萨尔米 (Jamil Salmi)：全球高等教育专家、智利迭戈波塔莱斯大学 (*Diego Portales University*) 高等教育政策名誉教授

电子邮件: 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玛丽亚·尤德科维奇 (Maria Yudkevich)：以色列海法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Haifa*) 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件: 2yudkevich@gmail.com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件: altbach@bc.edu

由于对本国顶尖大学在全球排名中的低迷表现感到忧虑，一些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启动了大规模、由政府投入的学术卓越计划 (*academic excellence initiatives*)，以提升科研产出和成果。我们新出版的书籍《学术星球大战：全球视野下的卓越计划》 (*Academic Star Wars: Excellence Initiatives in Global Perspective*，由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于 2023 年出版) 分析了九个国家的卓越计划。

这些国家总计投入了大约 1000 亿美元来资助这些卓越计划。其中至少一半的资金是由中国政府投入，且中国在提升研究型大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功，这也显然推动了其在全球大学排名中的地位。各国卓越计划的目标、规模、资金投入，以及其成败，差异显著。这些案例还展示了一些意外的积极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英语国家、西半球和非洲地区，并没有实施此类卓越计划。

### 用排名来衡量的卓越

俄罗斯的“5-100 计划”并非唯一一个在

目标中明确提及排名的项目。2013 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计划在 10 年内 (即到 2023 年) 让 10 所日本大学跻身世界前 100 名，以此作为日本经济复苏的象征。同样，法国和德国的卓越计划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大学在全球前 50 名中缺乏存在感而做出的反应。

因此，“排名意识”成为许多甚至是大多数卓越计划的核心。尽管学术界有不少人质疑排名是否是衡量卓越的有意义指标，但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排名视为成功的关键标志，并以此作为为卓越计划分配资源的正当理由。

### 国际化

国际化被视为所有卓越计划的核心要素。许多卓越计划的设计中都假设国际竞争和全球可见性的直接推动作用，并为机构和个人在这一领域取得的进展提供了激励。国际化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中与卓越计划最相关的是通过合作共同发表文章、开展联合研

究项目，以及促进研究生、教授和研究人员的流动来实现研究的国际化。这些都是科学和学术国际化的标志。然而，在日本等国家，受语言、传统及其他障碍的影响，国际化仍面临诸多挑战。

国际化的进展通常通过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衡量，例如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或国际学者/学生的比例。韩国设定的国际化指标包括以英语授课的课程、项目和论文的比例，由外国学者授课的短期集中课程数量，以及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表数量。俄罗斯“5-100 计划”所资助的大学也采用了类似的衡量方法。

## 治理与政府角色

在大多数卓越计划中，政府不仅是主要的资金来源，还在目标设定与规则制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政府要求大学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一项来自丹麦政府的 2026 法案指出：“表现良好的大学应得到奖励，而质量不佳的学校则应承担相应的影响。”

这种直接的政府干预在大多数卓越计划中引起了一些担忧。例如，在中国台湾地区，政府的干预可能削弱了社会信任，并加剧了大学社区的焦虑。这进一步导致“卓越”的定义被简化为通过全球大学排名等简单指标来展示影响、质量和绩效。此外，日本、马来西亚和俄罗斯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施卓越计划的典型例子。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主导的角色，大多数卓越计划并未显著增加其他行业的参与，也未能帮助大学实现更大的财政可持续性。这与治理模式变化不大密切相关，反映了大学与政府之间依然存在的等级关系。

## 影响

有证据表明，卓越计划对受益大学的表现产生了显著影响，提升了这些大学的效率、科研产出、竞争力和全球知名度。这些计划还影响了人才（包括教职人员和学生）的分配与集中。此外，卓越计划对其他大学和国家科研体系整体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卓越计划促进了学术流动性，为处于职业初期的研究人员创造了更多机会。虽然较难量化，但卓越计划的隐形影响同样重要。这些影响包括对卓越的更高追求、更强的竞争意识，以及这些顶尖大学在国家和地区发展中日益重要的角色。

## 重大关切

同时，我们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部分案例表明，若无持续性资金支持，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可能难以维持下去。另一个问题是地方价值观与全球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世界一流大学模式通常与北美研究型大学模式相关联）。为了在排名中获得较高位置，大学可能需要向西方大学看齐，尤其是在资源、标准、绩效指标以及组织和治理模式方面。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案例对此提出了警示。

此外，一些国家担忧，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几所大学可能会导致全国高等教育体系其他部分资源匮乏。在法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区域不平等的问题也很突出，首都地区的大学获得了大部分额外资金。台湾的案例显示，大学在追求学术卓越时，与地方社区之间的联系较弱。在德国，高校内部不同学术单位之间也出现了紧张关系，那些未

参与卓越计划的单位与受益于国家卓越计划的中心之间存在矛盾。这些问题均在该书中得到了详细讨论。

## 结语

尽管在实施卓越计划时通常强调大学排名，案例研究表明，这些计划若能专注于国

家和大学的具体目标，而仅将排名作为与其他高校和国家进行比较的参考点，则会带来更多益处。高校需要一个更全面的学术卓越概念，而不仅仅局限于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相反，这一概念应推动追求科学真理和促进负责任的研究，以实现更广泛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高等教育的全球趋势与地方政策

N.V. · 瓦尔吉斯

N.V. · 瓦尔吉斯 (N.V. Varghese) : 印度孟买理工学院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mbay)  
特聘访问教授

电子邮件: nv.varghese@niepa.ac.in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高等教育经历了加速增长和全球扩张。从 2000 年到 2018 年,全球毛入学率 (gross enrollment ratio) 从 19% 增加到 38%。在过去 20 年,高等教育学生人数平均每年增加约 650 万人,而 1980 年至 2000 年间的年均增涨为 245 万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data) 的数据,2021 年全球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达到了 2.368 亿。更重要的是,女性成为大学和高等院校的学生主体,占全球总入学人数的 52%。

南半球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增加了 91%。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 2000 年至 2018 年间的增幅最大,达到了 125%。印度和中国的扩张速度最快,两国在 2021 年全球入学人数中占据了近 40% 的份额。预计在未来几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将继续是唯一一个年轻人口和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持续增长的地区。

### 正在缩减的高等教育系统

全球趋势掩盖了地方性的差异,高等教育的扩张在各国之间并不均衡。有趣的是,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出现了入学人数停滞或下降的现象。例如,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实际上出现了萎缩。在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中出现了人口出生率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因此大多数

国家都面临人口下降的挑战。据估计,部分东亚地区的学生人数到 2040 年可能下降近 40%。

人口下降的趋势导致了“边缘大学”现象,这些大学由于学生人数不足而陷入财务困境,面临关闭的边缘。在韩国,首都地区以外的许多公立大学和近 75% 的私立大学,都受到了学生人数下降的严重影响。它们只能作为“僵尸大学”生存,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韩国有约 84 所这样的边缘大学。在日本,由于学生人数不足,已关闭了几所大学,并合并了许多其他大学。日本政府进一步计划关闭那些连续三年无法招到足够学生的大学。在一些国家,也有人提议出售大学财产以确保其财务生存。

曾在教育市场上享有优势的医学和工程学校,现在在印度经常面临招生空缺。过去三年里,印度有 860 个医学学生名额空缺,原因是私立医学院收取的高额学费。许多学生选择前往东欧国家或中国求学,享受这些国家低成本的医学教育。由于家庭不愿投资“低价值”高成本的工程学位,印度许多工程学院也因学生不足而关闭。

### 内向型本土政策

全球化进程将国家系统融入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但许多趋势现在正在发生逆转,因为许多国家已开始采取内向型政策。例

如，英国的脱欧政策，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印度优先考虑本土知识体系的自力更生政策，国家优先的政策，以本土人才取代国际专家，以及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系统而非基于西方标准的高等教育系统，都是内向型政策的例子。似乎在政治利益方面，投资于民族主义和内向型政策正变得愈发有利。

## 大学教育值得吗？

对于表现最好的学生而言，大学教育的工资溢价很高，而大多数毕业生，即大多数处于平均和较差表现的学生，却没有从投资中获得高的教育回报。鉴于高等教育的高成本，许多学生都在问自己：大学教育真的值得吗？《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在 2023 年 3 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指出了一场信任危机：56% 的美国人认为学位已经不再值得为其投入时间和金钱。2023 年 8 月，《经济学人》（*Economist*）报告了过去几十年中，本科教育的回报率不断下降。在金融危机后的时期，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下降，而这一变化在年轻人和初入职场的劳动力中尤为明显。

回报的极端化使得精英院校的招生竞争异常激烈，并导致了“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显著增长。人们认为私人辅导非常重要，因为其能提高学生在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中的表现。事实上，私

人辅导正在加剧教育不平等，倾向于有特权家庭背景的孩子。

## 多样性与精英主义

高等教育一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特权阶层的专利。高等教育的普及吸引了来自非传统群体、弱势群体以及偏远农村地区的学生。学生多样性的增加对全球高等教育机构的社会排他性和精英主义做法提出了挑战。

多样性也对教学语言产生影响，因为教学语言可能与社会互动语言不同，尤其对于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而言。精英大学为高端就业提供学历认证，可能会拒绝回应多样性挑战，仍然保持“保守的圣殿和生存的主宰”。尽管全球南方的私立精英大学数量有限，但它们强化了保守主义，并在寻求进入这些院校的精英中享有市场溢价。

## 结语

本世纪，低收入国家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加速扩展和大众化，而一些成熟的教育系统则出现了收缩。高等教育的扩展是由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推动的，这与失业率和教育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密切相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吸引了来自非传统背景的学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校园内的学生多样性。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工作多样性仍然是大多数国家的制度性挑战。

##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与未来：第六版国际大学协会全球调查分析纳

乔治·马里诺尼、希莉吉·范特兰德、汉斯·德·维特

乔治·马里诺尼 (Giorgio Marinoni)：国际大学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高等教育与国际化项目负责人

电子邮件：g.marinoni@iau-aiu.net

希莉吉·范特兰德 (Hillegje van't Land)：国际大学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秘书长

电子邮件：h.vantland@iau-aiu.net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荣誉教授

电子邮件：dewitj@bc.edu

在第五版发布五年后，国际大学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于 2023 年进行了第六版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调查 (以下简称为第六版 IAU 全球调查)。五年的周期是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以期进行有意义的时间对比，因为五年时间既能让国际化进程有所发展并进行分析，又不会过长以至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

然而，过去五年中，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仅需想到新冠疫情的爆发，或地缘政治的变化，例如国家间新出现的紧张关系和新爆发的战争，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因此，第六版 IAU 全球调查恰逢其时，调查能够全面描绘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捕捉上述变化，并为国际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指引。

第六版 IAU 全球调查通过在线机构问卷于 2023 年 1 月至 6 月间进行，提供了三种语言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版本。调查揭示了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趋势与发展变化，并提供了有趣的比较，既比较了私立

与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也比较了来自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异。此外，通过与以往版本的结果进行比较 (在可能的情况下)，该调查还提供了一些趋势随时间演变的信息。

### 调查结果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全球学术领导层普遍高度重视国际化，并且这种重视程度在那些将国际化视为次要任务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也有所增加。这一结果显示，第五版调查中提到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趋势正得以扭转，并为未来带来了希望。

调查的另一个积极结果是，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普遍认为，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是国际化的主要利益。这一趋势在第五版全球调查中已有体现，并在本次调查中得到了确认。尽管在国际化活动的优先级上，学生流动性依然是重点，但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是过去五年中增长最快的活动，表明高等教育机构正在朝着预期利益与实现这些利益的活动之间的趋同方向发展。

调查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全球多样性的特点，在国际化的某些方面，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例如，风险、挑战与障碍的种类繁多，有些差异可以通过区域分析加以解释，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人才流失”视为最重要的风险。然而，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地区之间，即使在同一地区内部也存在差异，表明除了地理位置外，还有其他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趋势的形成。

调查结果还强调了国际化作为一个战略过程的普遍认知特点。同时，它也揭示了一些局限性，尤其是在资金方面。此外，结果显示，国际化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主要由学术领导层和专门的国际化办公室主导。这提醒我们需要反思这种方式可能导致其他学术群体参与不足的潜在风险。

全球范围内仍然存在地理不平衡现象，全球北方地区（欧洲和北美）仍然受到最多的关注，而南南合作（除区域内合作外）依然未被视为优先事项。这一结果证实了某些地区正在出现区域化趋势，但这一趋势并非普遍适用于所有地区。同时，也验证了北美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的独特情况，北美往往在调查中展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结果。

这种多样性提醒我们，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均等分配，同时也存在持续的不平等风险。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新冠疫情在推动国际化变化方面的作用远未达到预期的显著程度。尽管疫情确实推动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虚拟国际化的发展方面，但它并不是过去五年国际化变化的唯一或最关键因素。

最后，第六届 IAU 全球调查提供了关于国际化一些具体方面演变的深刻洞察，涵盖了教学与学习、研究和社区参与的变化，并揭示了国际化与其他重要优先事项（如可持

续发展、多样性、公平与包容性）之间的联系。此外，国际化还在抗击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促进跨文化理解及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 结语

总而言之，第六届 IAU 全球调查描绘了全球国际化现状的全面图景，展示了近年来国际化的发展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调查中体现了国际化的积极进展，这值得庆祝，但并非所有调查结果都是积极的。一些改善和变化仍然是边际性的和零散的，更多地体现在话语中而非实际操作中，排斥和不平等依然存在。

此外，调查并非详尽无遗，最终结果可能引发更多问题，甚至超过它所回答的问题。在许多方面，调查结果只是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和改进的需求，第六届 IAU 全球调查仍是全球范围内关于国际化的唯一全面机构调查，提供了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宝贵信息。基于全球大学国际化领域领导者的意见和看法，调查结果揭示了雄心勃勃的目标、积极的举措与面临的重大挑战之间的紧张关系。

凭借国际大学协会与全球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IAU 全球调查的结果应被视作提升质量、促进包容性、保障公平性以及履行社会责任的工具，这些将成为未来五年国际化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在此期间，当前的挑战和期望不会减退。

注：该调查由国际大学协会（IAU）与全球 16 个主要组织合作开展。所有合作伙伴的名单可以在 IAU 网站上找到。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省教育研究学院（OISE）合作开展了“国

际化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项目(*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该项目由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资助。完整报告可在 IAU 网站上免费下载。

## 高等教育中的心理健康危机：来自新加坡的洞察

安妮特·布拉德福德、石仓佑季子、霍华德·布朗

戴维·斯坦菲尔德 (Dave Stanfield)：美国莎拉·劳伦斯学院 (Sarah Lawrence College) 学生事务副校长、学生事务主任，曾任新加坡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 (Yale-NUS College) 副校长、学生事务主任

电子邮件：dstanfield@sarahlawrence.edu

安德鲁·泰 (Andrew Tay)：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健康与福祉办公室主任

电子邮件：aet@nus.edu.sg

关于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理健康挑战的讨论已不胜枚举。学生中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很高，而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管理者们面临着如何提供足够心理健康服务的巨大挑战。尽管曾经的污名化观念曾阻碍学生寻求专业帮助，但研究表明一些弱势群体仍然不太倾向利用这些资源。大多数院校中学生对于心理咨询的需求远超供给。

心理健康的原因、发生率和诊断标准在不同国家之间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多数管理者都会将学生心理健康列为关注的重点。同样，没有学校不在为应对这一问题而苦苦挣扎。缺乏足够的心理健康支持对学生和学校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包括更高的学业困境和辍学率。

新加坡是一个在高等教育领域高度关注心理健康的典型例子。2022 年一项研究显示，在新冠疫情最严格的限制时期，新加坡旗舰高校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四分之三的学生面临抑郁风险，超过 83% 的学生表示压力很大。新加坡的高等院校认识到仅仅增加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招聘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而正在实施全面的心理健康应对措施。

###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将心理健康支持的责任分担给整个学校，可以减轻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压力。新加坡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 (由耶鲁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建立的住宿制文理学院，以下简称耶鲁—NUS 学院) 利用经过培训的学生事务工作人员和学术顾问来处理和管理较低级别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轻度的学业压力和社交焦虑。工作人员接受由心理咨询同事组织的内部培训，并且有些人通过外部项目 (如心理健康急救等) 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专业能力。

2021 年，随着越来越多的教学人员遇到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耶鲁—NUS 学院推出了“守门员培训” (goalkeeper training)，该培训内容包括如何识别情绪困扰的迹象，教授同理心和积极倾听技巧，并解释向学生解释各种可利用资源。教师和助教通常是最早察觉到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因为他们经常在课堂上、辅导预约和办公时间与学生互动。管理人员应确保教师能够访问并使用内部转介系统，并在意识到需要专业治疗介入时及时提醒相关工作人员。

新加坡国立大学意识到在心理健康问题中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并在 2021 年创建了“WellNUS©心理健康框架”(WellNUS© Mental Health Framework)，旨在系统地规划并制定不同的幸福感定义，并识别相关的举措和关键利益相关者以提供支持。该框架的目标是采用更全面、结构化和可持续的方法来关注学生和员工的福祉。

## 主动和预防性措施

2021 年，耶鲁—NUS 学院为大一新生推出了一门学分课程——《大学中的韧性与成功》(Resilience and Success in College)，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应对大学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挑战和逆境的策略。课程内容包括寻找人生意义、发挥个人优势、练习脆弱性和发展积极的人际关系等主题。该课程后来还进行了调整，专门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应对毕业后的过渡期，因为这一时期毕业生们也常常承受着各种压力。

这门为期六周的课程是学生事务部门与心理学系合作的成果，课堂以研讨会形式进行，强调个人反思和实践应用。参加完该课程的学生表示，他们更能应对未来的挑战，并理解自己可以获得哪些支持资源。

## 组织结构

在英国，学校通过《大学心理健康宪章》(The University Mental Health Charter)和《教育员工健康宪章》(The Education Staff Wellbeing Charter)来关注员工的福祉。这一原则基于学生和员工的福祉是密不可分且相互支持的。因此，英国呼吁采取全校范围开展心理服务的方法，以便更好地应对心理健康风险。自然，这需要对关心学生和员工群体的组织结构进行审视。新加坡国立大学走

了一条类似的道路，投入大量资源关注员工的福祉，包括为大学员工专门配备的内部辅导团队。此外，学生和员工也被招募并接受培训，作为“同伴支持者”提供基本的情感支持和应对技巧，帮助有需要的同学和同事。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y University)设立了直接向大学校长和教务长汇报的福祉办公室，这标志着高层对解决心理健康风险的承诺。这些大学通过中央健康办公室协调为员工和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并让他们共同参与与战略性的项目宣传活动。这种方法与英国和美国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在这些国家员工的心理健康支持通常由人力资源部门提供(通常通过外部保险公司)，而学生的心理健康支持则由学生事务部门提供。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职工和学生心理健康策略与方法的整合有助于在整个大学社区中推动一致的心理健康宣传信息和资源意识。在影响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开展的#AreuOK 活动减少了寻求帮助污名化，提高了学生与员工对心理健康资源的意识，并增加了他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利用。

## 心理健康服务创新

自新冠疫情以来，许多大学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急剧增加，导致现有的辅导能力承受巨大压力，因此，各大机构应仔细考虑一些具有前景的新技术。例如，启用人工智能(AI)的聊天机器人和其他类型的在线应用在近年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市场上已有成千上万的心理相关自助应用程序。虽然关于这些技术的有效性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但一些有前景的研究已经开始考察特定技术平台的效果。随着创新解决方案

的部署，它们应被视为对现有、已建立的心理健康解决方案的补充。

其他基于技术的方法仍处于早期阶段。例如，数字表型（digital phenotyping）指通过智能设备被动追踪和主动请求数据，从而评估和预测心理健康风险。例如，学生可以选择通过短信接收健康相关问题，从而向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提供及时的信息，预测学生何时处于风险之中。机构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相应的干预，防止心理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将这一概念推向更深层次，大学可能会根据通过数字设备收集的数据（例如睡眠质量或数字足迹，以及学生如何使用学习管理系统）来量化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这将使管理人员能够预测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趋

势。尽管这一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显示出一定的潜力。

一个显而易见的挑战是此类方法所需的个人数据收集具有侵入性，且涉及隐私问题。然而，具有前瞻性的国家（如新加坡）正在评估这些创新技术，并将其作为可能的补充措施，融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其他本地大学心理健康支持的整体性方法中。

随着全球高等教育中的心理健康危机持续，大学心理健康服务将继续面临巨大的需求压力。新加坡的整体性和主动性方法——通过创建多样化的健康途径，并将心理健康支持视为整个机构的集体责任——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框架，值得在其他地方推广应用。

## 美国学生贷款债务危机及其长期经济影响

F·金·亚历山大

F·金·亚历山大 (F. King Alexander)：美国佛罗里达海湾大学 (Florida Gulf Coast University) 教育领导力教授、阿拉巴马大学 (University of Alabama) 教育政策中心高级教员、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高等教育研究院教员合作伙伴

电子邮件：falexander@fgcu.edu

### 为了更好地理解

美国 1.8 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危机影响了近 4500 万名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危机及其带来的影响，纳税人需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而不是仅仅将责任归咎于学生贷款借款人。在过去的 50 年里，政策制定者创建了一个联邦资助计划，激励州政府减少资金投入，并鼓励依赖学费资助的高等教育模式。正如霍普曼 (Arthur Hauptman) 在 2011 年指出的：“常识告诉我们，学生贷款的普及和合理的利率，使得许多高校更容易提高学费，就像按揭利息扣除有助于推高房价一样。”更复杂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拜登总统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该计划原本可以取消近 2300 万借款人的学生贷款债务。自从这一裁决以来，拜登总统宣布了大幅缩减的计划，但此项计划仅解决了这个国家问题的一小部分。

保守派政治家、私人学生贷款服务商以及管理商业持有的联邦助学贷款的主要公司批评拜登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他们认为既然学生是自愿获得贷款的，那么学生自己应该负责偿还贷款。批评者还声称，4300 亿美元的贷款减免计划将由于赤字增长而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类似的指控曾在 1935 年《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 和

1944 年《退伍军人法案》(the G.I. Bill) 开始时出现，但并未实现。这其实是用简化的方式来审视这个复杂问题，涉及州政府的资金决策以及联邦贷款的充足供应，这些都激励了许多大学和高校采取更多依赖学费收入的模式。

### 多米诺效应

问题的核心在于数十年来州政府减少资金投入导致学费和费用不断上涨，而联邦政府通过其超过 1000 亿美元的联邦贷款计划来支撑这一体系。随着联邦贷款的扩展，州政府的资金撤回进一步加剧，许多公立大学和学院将其财务依赖从州政府转向更多依赖学费收入的模式。结果是，目前州政府对公立高等教育的投资 (即“税收努力”或“财政能力”) 比 1980 年减少了近 50%。此外，尽管在同一时期招生人数增长了近 20%，但超过一半的州在实际支出上对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投入低于 1991 年的水平。

公立大学和学院并不是唯一受到间接激励而变得更加依赖学费和费用的机构。为了应对这些慷慨的联邦贷款计划，独立部门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非营利私立大学和营利性机构，也在财政上对联邦贷款计划形成了依赖。这些变化对代表性不足和低收入群体的不成比例影响，正逐渐被认识和理解。

## 长期经济后果

这一复杂问题的经济后果已经开始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各个领域，包括小企业、住房、汽车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消费市场。2019 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强调了全国家庭拥有率的下降，特别是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中，他们的住房拥有率下降速度几乎是整体人口的两倍（2005~2014 年间）。联邦储备银行还报告称，学生债务占到了整体下降的近四分之一，并且使 40 万年轻人无法在此期间购房。报告还指出，教育债务的增加提高了借款人违约的概率，进而影响了他们的信用评分和申请抵押贷款的能力。

在过去三年中，千禧一代租房者放弃购房的比例增加了 65.7%。住房市场的预期风险是，我们正在培养一代租房者，而非购房者。最终，住房拥有率的持续下降将导致银行和投资公司收入的大幅减少，而这些公司曾反对拜登政府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

另一个长期的经济影响是，巨额学生债务降低了负债者的消费能力。据教育数据倡议组织（Education Data Initiative）估算，每当一位毕业生或未毕业学生的债务与收入比增加 1%，他们的消费支出就会减少多达 3.7%。此外，2018 年借贷树公司（LendingTree Inc.）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十位借款人中就有一位表示，由于学生债务，他们无法支付购买新车的费用。除了住房和汽车消费市场，服装、房屋修缮、娱乐、旅行和食品等领域也开始意识到，给下一代美国消费者背上沉重的学生贷款债务，最终会对他们的底线利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或许对国家最具破坏性的经济后果出现在小型企业市场。根据 2015 年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报告，学生贷款债务的增加约为 3.3%，导致宾夕法尼亚州每个县的小企业和公司成立率下降了 14.4%。

此外，学生贷款债务的上升将使年轻人无法为退休储蓄和应对经济危机，从而使他们日益依赖社会福利和政府机构。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学生债务的上升已经推迟了结婚和组建家庭的进程，这正日益成为全国性的关注问题。这些经济和社会效应并非短期现象，而且对黑人、西班牙裔和女性借款人的影响尤为严重。

最后，美国那些背负沉重学生贷款债务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减少支出，因为学生贷款债务是唯一无法通过破产法律解决的债务。正如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所言：“破产法可以帮助公司顺利进行重组，但却无法帮助负担学生贷款的大学毕业生。”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警告说，“随着时间推移，学生贷款的规模不断扩大，它绝对有可能拖慢经济发展。”如果重要的改革和调整被忽视，今天大学毕业生面临的问题将对美国的每一个企业、政府机构和公民产生经济后果。

注：本文基于 2023 年 10 月 3 日在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中心（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举行的国际网络研讨会以及 2023 年夏季《教育财务期刊》（*Journal of Education Finance*）上的一篇评论文章。

## 国际危机时期的高等教育融资：澳大利亚的例外

布鲁斯·查普曼

布鲁斯·查普曼 (Bruce Chapma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商学院教授

电子邮件：Bruce.Chapman@anu.edu.au

毫无疑问，大多数国家的学生贷款系统目前正处于危机之中，或者至少面临重大困难。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商业封锁，劳动市场的短期功能失调暴露了高等教育融资安排中的重大问题。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一问题原因已经得到了澄清。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成功避免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而遭受学生贷款困境的国家之一。

关键点在于，澳大利亚自 1989 年启动的学生贷款系统，成为首个以个人未来收入为基础的还款方式来收回学生债务的高等教育融资模式。这一特征源于对债务人需要对抗突发、不可避免的毕业生劳动市场不利状况的保险需求的认识，确保在高等教育融资过程中，借款风险得到实质性减轻。显然，这是澳大利亚模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积极特征，后来这一模式被新西兰（1991 年）、英国（1998 年）、匈牙利（2002 年）全面采用，并部分实施于美国、日本、韩国、泰国和哥伦比亚，目前在许多其他地区也在密切考虑这种做法。

### 为什么某种形式的学生贷款能够保护借款人

理解学生贷款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至关重要，这两种方式主要是由贷款还款的规则来定义的。国际上最常见的方式被称为“基于时间的还款贷款” (time-based repayment

loans)，这种方式与抵押贷款类似，在规定的时间内（如美国广泛使用的斯塔福德贷款为期 10 年，巴西的贷款系统为期 8 年）需要按固定的还款额进行偿还。

另一种方式，是“收入挂钩贷款” (income-contingent loan)，它在过去三十年中悄然改变了国际高等教育融资政策，贷款的还款仅取决于借款人的未来收入。这两种贷款系统的本质区别在于，“收入挂钩贷款”能够保护借款人免受还款困难和违约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收入挂钩贷款”的借款人在某一时期没有还款能力，则不会产生不利后果，例如不得不从其他地方筹集资金，甚至违约。

为了说明这种方式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来举个例子，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收入挂钩贷款”系统中，只有当借款人的年收入超过大约 5.2 万澳元和 2.8 万英镑时（大约等于 3.5 万美元），才需要开始还款。随着收入的增加，贷款的偿还比例也会相应增加，类似于渐进税制的收入税收方式，在大多数国家，“收入挂钩贷款”还会伴随有利率补贴。

而“基于时间的还款贷款”则没有这种对借款人的保护，这意味着当借款人在经济状况不佳时难以偿还贷款，违约成为许多国家的普遍现象。这导致大量的学生贷款借款人违约。学生贷款违约对借款人构成了极大的问题，因为这会损害其信用声誉，从而严

重限制个人获得正常商业贷款的能力，例如购房贷款。美国的研究表明，一些潜在借款人由于预期的高风险和违约后果，抵制接受“基于时间的还款贷款”。

此外，学生贷款违约对于贷款方（通常是政府）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一旦借款人正式被宣布违约，这个人将不再继续偿还贷款。因此，未偿还债务造成的损失变成了政府的支出，从而在财政上限制了未来公共部门对高等教育的支持能力。

上述国际学生贷款比较在新冠疫情中呈现出了新的、更为严峻的维度，这些变化在疫情前并未被预料或理解。在许多国家，数千万名应届毕业生由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效应未能迅速找到工作。有“基于时间的还款贷款”的前大学生（例如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马来西亚、泰国和美国）因此面临无法偿还债务的重大焦虑问题。

这一危机导致了重大的学生贷款干预，最著名的是拜登总统在 2022 年 8 月宣布的计划，免除近 50 亿美元的学生贷款，而其他国家则实施了延长“基于时间的还款贷款”还款暂停的政策。这些干预措施对于纳税人来说代价巨大，而对于像澳大利亚这样实行“收入挂钩贷款”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必要的。

## 澳大利亚学生在疫情期间及其后的贷款经验

与“基于时间的还款贷款”系统不同，采用“收入挂钩贷款”系统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匈牙利、新西兰和英国）并未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保护高等教育债务人免受与疫情相关的短期危机。这是因为“收入挂钩贷款”系统自带的保险功能能够为债务人提供

保护，避免他们遭遇还款困难或违约。“收入挂钩贷款”债务人在无法偿还贷款的时期不需要进行还款。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澳大利亚在设计学生贷款系统时，已经认识到“收入挂钩贷款”保险优势的关键维度，特别是对于因疾病或照顾无法行动的家庭成员等不利个人情况的应对。然而，设计时并未预见到“收入挂钩贷款”系统对整个借款群体也具有隐性保护作用，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广泛受到冲击时。新冠疫情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收入挂钩贷款”保护的重要性，这可以通过借款人违约学生贷款的前景和后果来进一步强调。如上所述，违约对借款人和贷款方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成本：借款人会因违约而难以获得进一步的信贷，贷款方则几乎无法从违约者处收回贷款。违约率可能极高，在某些国家可能高达 40-50%，即使在一些学生贷款偿还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如美国，违约率也能高达 20%。目前，美国有超过 1200 万名曾经上过大学的学生被列为违约者，这些人未来的借款前景已经严重受损。

在澳大利亚，没有学生贷款违约者，因此也没有因违约而名誉受损的借款人，因为“收入挂钩贷款”系统自动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帮助那些未来可能遇到经济困难的人。因此，尽管澳大利亚当前的学生贷款状况可能需要改进（就像所有实施了 35 年的政策一样），但在还款体验的根本方面，澳大利亚并没有像大多数采用非“收入挂钩贷款”高等教育融资计划的国家那样面临类似的危机，也没有经历这些危机带来的巨大成本。

## 基于收入的学生贷款债务对英国毕业生生活的影响

克莱尔·卡伦德

克莱尔·卡伦德 (Claire Callender)：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教育与  
社会学院教育学研究所高等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件：claire.callender@ucl.ac.uk

面对高等教育的扩展和公共资金的有限，全球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学生贷款政策，将更多的高等教育费用转嫁给毕业生。然而，人们对毕业生日益增加的学生贷款债务以及其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日益关注。

全球范围内，“收入挂钩贷款”被认为是缓解学生贷款债务带来的财务困境的潜在解决方案，因为这种贷款的还款是基于毕业生的收入进行的，能够保护借款人免受过度还款、财务困难或违约的困扰。与之相比，“基于时间的还款贷款”是全球最常见的贷款类型，但其还款金额是根据借款总额加上利息，除以贷款期限来计算的，无法提供类似的保护。

本文以英国为案例，质疑“收入挂钩贷款”在保护毕业生免受债务负面影响方面的有效性。

### 英国的学费和“收入挂钩贷款”

英国在 1990 年代面临着高等教育扩展、教育公平和质量之间的权衡挑战，并开始处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系统转型的经济现实可能性。1990 年，英格兰推出了政府资助的本科生生活费用贷款，最终取代了原先的生活津贴。2006 年，英国首次对所有本国本科生收取学费。从那时起，学费从每年最高 3000 英镑增加到目前的 9250 英镑，这一标准几乎应用于所有大学的本科课程，成

为经合组织 (OECD) 中最高的平均学费。

自 2006 年以来，所有在英格兰定居并在英国学习的学生都可以获得“收入挂钩贷款”，这些贷款涵盖了他们的全部学费和部分生活费，且这是目前唯一可用的政府资助的经济援助形式。学生毕业后，一旦收入超过政府设定的还款起点，他们便开始偿还贷款。然后，他们将支付超过起点部分收入的 9%，直到贷款偿还完毕，或者债务被注销——目前是 40 年后。还款通过税收系统自动从毕业生的工资中扣除。这些保护性措施有助于将毕业生从贷款债务的财务负担中解救出来。

随着英国学费的上涨，贷款的申请率也相应上升 (2020~2021 年为 95%)，借款的平均金额也随着增加 (2022 年毕业生的平均债务为 46000 英镑)。因此，学生债务的普遍性已经不再局限于具有特定人口和社会经济背景的毕业生。结果，英格兰的毕业生平均需要比其他地方的同龄人更长的时间来偿还债务，这对学生贷款债务对毕业生生活的长期影响产生了重要影响。

### “收入挂钩贷款”的优势

与“基于时间的还款贷款”相比，“收入挂钩贷款”被认为更具公平性和更为理想。它们被认为是公平的，因为那些从高等教育中获益的个人会在有能力偿还时为其成本做

做贡献。“收入挂钩贷款”被视为进步性的，因为高收入的毕业生偿还更多的贷款，而政府为低收入毕业生提供的补贴则较少。这些贷款也被认为是积极的，因为它们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帮助资助教育的扩展。

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士将“收入挂钩贷款”描述为主要无害的，因为它们是基于收入的，并旨在保护债务人免受债务的财务负担。因此，借款的金额被政策制定者视为对毕业生来说并不重要。事实上，政府政策鼓励负债，认为它是对未来收入潜力的投资，并将其视为正常现象。

政府对“收入挂钩贷款”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以及减少公共支出的必要性，这些支出是相当可观的——预计到 2040 年代中期，英国的未偿贷款总额将达到 4600 亿英镑（按 2021–2022 年的价格计算）。

## 有关学生贷款对毕业生生活影响的研究

虽然“收入挂钩贷款”优于“基于时间的还款贷款”，但“收入挂钩贷款”债务对毕业生生活的个人经济和心理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政府的言辞和现有的大多数研究忽视了偿还这些贷款的现实情况。现有的关于负债毕业生的研究大多是经济驱动的定量研究，且主要基于美国。然而，专注于美国的研究对英国的相关性有限，因为两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差异，尤其是在金融援助方面，美国的系统更为复杂、多样且具有惩罚性。

关于“收入挂钩贷款”的其他研究未能深入探讨毕业生负债的实际经验。我们的一项定量和质性相结合的研究计划旨在填补这些空白，探讨“收入挂钩贷款”债务对英国毕业生生活、行为和选择的影响。

我们的定量研究显示，25 岁且没有贷款的毕业生比有贷款的毕业生更可能拥有自己的房产，也更不可能租房或与父母同住，这与一些美国的研究结果相呼应。这一发现表明，高等教育资助政策和学生债务在构建英国年轻人住房选择中起着重要作用，质疑了一些高等教育所声称的财务收益，并强调了债务如何加剧财富不平等的现象。

我们的质性研究提供了其他的分析和观察。与 100 名毕业生的访谈显示，他们欣赏“收入挂钩贷款”的保护性特点，包括可负担的每月还款，这些还款会自动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但这些毕业生，特别是那些负债较高的毕业生，认为学费和利率过高，且债务数额沉重，永无止境的还款成为负担。

对这些访谈的进一步分析揭示了国家与毕业生债务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依赖基础上的，因此这一关系存在很大的问题。政府认为贷款制度是公平的，但毕业生却表现出遭受伤害的迹象，并且以不同的、甚至有时令人不安的方式作出回应。一些人采取了应对机制，如回避和屈从于贷款制度和政策言辞。负疚感充斥其间，伴随着内化和自责。许多没有看到更好就业结果的人开始质疑这个系统及其未兑现的承诺。大多数人不仅将责任归咎于系统和政府，也归咎于自己。

因此，政策言辞中对“收入挂钩贷款”的积极和无害的描述，与一些毕业生对贷款债务的主观体验似乎存在冲突。在我们的研究中，只有少数几名毕业生（毕业 10 到 12 年）没有经历任何负面后果。大多数毕业生尽管可能仅受轻微负面影响，但还是承受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而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则经历了多重不利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进一步学习、就业、住房、家庭形成以及心理和财务健康与安全方面的

决策——这一点也与美国的研究结果相呼应。我们的研究表明，“收入挂钩贷款”的保护特性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说成功地防止或最小化了债务的负面后果，但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却未能有效地保护他们免受更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们认为，“收入挂钩贷款”内建的保障措施主要是为了减轻债务的财务负担，而不是减轻心理负担。我们对这些贷款保护性显性无效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某些毕业生来说，债务的心理负担与财务负担一样重要，两者的相互作用更是值得关注。两者结合起

来，导致一些毕业生以有害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生活选择，可能削弱他们的抱负，限制他们的机会。

我们的研究表明，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学生债务对毕业生心理上的影响，以及它如何在“收入挂钩贷款”的背景下对他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政策制定者应当更加重视学生贷款债务对毕业生的全方位影响，并推动全球政策设计的转变，认识到这一点，提供更全面的支持措施，以更好地保护毕业生免受债务带来的财务和心理负担。

## 基于绩效的大学资助：欧洲过去与现在

尤西·基维斯托、卡特丽娜·苏普伦

尤西·基维斯托 (Jussi Kivistö)：芬兰坦佩雷大学 (Tampere University) 管理与商业学院高等教育管理教授

电子邮件: jussi.kivisto@tuni.fi

卡特丽娜·苏普伦 (Kateryna Suprun)：芬兰坦佩雷大学管理与商业学院博士生

电子邮件: kateryna.suprun@tuni.fi

多年来，基于绩效的资助 (performance-based funding) 已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分配公共资金的一种常见模式。最初，它在发达经济体中兴起，随后逐步推广至许多新兴经济体。这种资助模式有望通过激励措施推动大学内部产生积极的行为变化，从而提升整体表现。此外，基于绩效的资助还被认为能够促进透明度 (明确的分配标准)、问责制 (评估大学的实际产出) 以及合法性 (所有大学依据相同的分配标准)。通常，这一资助模式的引入与治理改革相伴，进一步扩大了公立大学的自主权。基于绩效的资助框架下，大学的自主权被视为一种优势，因为它使大学能够采用新的管理工具来响应激励措施，并更加灵活地运用这些工具。

实施基于绩效的资助最普遍的方法是将绩效指标纳入资助公式。在研究资助方面，通常依据对科学研究产量数量和质量的评估，尽管具体评估方式因机构而异。一些资助机构主要依靠文献计量指标，而另一些则依赖同行评审。此外，教师争取到的外部研究资金以及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也常被列为重要指标。在教学方面，常用的绩效指标包括授予学位的数量、累计学分、毕业率以及毕业生的就业率。基于绩效的资助公式通常综合使用输入和输出指标，并依据这些指标

与政策优先事项的相关性赋予不同的权重——权重越高，表明该指标在政策中的重要性越高。

### 早期采用者与后期跟随者

在欧洲，基于绩效的资助目前已经在绝大多数高等教育系统中应用，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然而，欧洲委员会最近委托的一项研究发现，欧洲的基于绩效的资助体系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主要体现在资助公式的组成、由基于绩效的标准决定的公共资金比例，以及谈判或协议在资金分配中所扮演的角色。目前，大多数系统中由基于绩效的标准决定的核心资金比例在 15% 至 59% 之间。只有少数国家，如丹麦 (80%) 和芬兰 (76%)，基于绩效的资助在核心资金中占比超过 70%。

在欧洲，不同国家基于绩效的资助系统的成熟度也存在很大差异。除了美国，西欧国家中最早采用基于绩效的资助的包括芬兰、丹麦和荷兰，这些国家自 1990 年代起就广泛应用这一体系。英国于 1986 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引入名为“研究评估工作”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的基于绩效的资助系统，后更名为“研究评估框架” (Research Assessment Framework)。然而，一些成熟的

基于绩效的资助系统现在正逐步减少对这一模式的依赖。例如，荷兰和挪威政府近期决定不再将出版物数量作为研究资金分配的标准。芬兰国内也有许多声音呼吁降低基于绩效的资助在大学核心资金中的占比，而英国的研究评估框架计划于 2028 年调整，以更具包容性，认可并奖励更广泛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许多东欧国家正开始迈出实施基于绩效的资助的第一步。例如，拉脱维亚和乌克兰在过去十年内引入了这一体系。拉脱维亚于 2015 年将部分核心资金依据绩效指标进行分配，而乌克兰则在 2020-2021 年实施了基于绩效的资助。然而，由于 2022 年俄罗斯的军事入侵，改革进程被迫中断。在实施的两年间，乌克兰的基于绩效的资助占核心资金的 12% 至 22%，资金分配基于学生数量、吸引的研究资金、全球排名位置以及毕业生就业率。然而，与其他国家的成功实践不同，乌克兰的大学在引入基于绩效的资助后并未获得更高的财政自主权。尽管如此，这一体系极大地提升了乌克兰高等教育公共资金分配的透明度。到 2023 年年中，乌克兰政府重新启动了关于恢复基于绩效的资助的讨论，并计划调整其设计以适应战时受损行业的需求。如果这一计划完成，乌克兰将成为首个在危机中成功实施基于绩效的资助体系的国家。

### 多样性是未来的关键

这篇简短的回顾性分析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构思绩效资助的重要启示，既适用于当前，也具有未来指导意义。

首先，需要认识到，不同国家根据其基于绩效的资助系统的成熟度，正在朝着不同

的方向发展。将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系统置于同一框架内进行比较并无太大实际意义。因此，评估基于绩效的资助影响时，应该更明确地讨论并反映这些差异。事实上，国家从采用基于绩效的资助逐步过渡或退出这一模式是有合理依据的。基于绩效的资助往往被视为一种提高效率的周期性工具，而非永久性解决方案。因此，对于长期实施这一体系的国家来说，适时进行调整和暂停，有助于为系统提供恢复机会，发现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不平衡或问题。而对于新加入这一体系的国家来说，确保政策实施的一致性至关重要，以便实现既定目标，并在这一通常不受欢迎的改革轨道上保持稳定。

第二个重要启示是，后来加入的国家应充分利用早期采用者的经验。几十年来，基于绩效的资助实践已为全球政策借鉴和转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积累。尽管具体国情在实施中具有关键作用，但并不需要每个国家从零开始重新探索这一体系的设计和实施方式。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基于绩效的资助模型的趋同不应被视为最终目标。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很容易陷入一种推动“黄金标准”的误区，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统一的模式。然而，有力的政策研究已表明，基于绩效的资助体系中存在若干相似之处，这些可以被广泛视为良好实践，包括明确的目标设定、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指标的平衡设计，以及针对机构多样性问题的有效解决。这些良好实践在适当情况下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但它们不应凌驾于国家的实际差异之上，而应被视为对这些差异的补充和支持。

## 成本与公平：解读肯尼亚大学融资改革

伊什梅尔·I·穆内内

伊什梅尔·I·穆内内 (Ishmael I. Munene):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教育领导学系教授

电子邮件: [Ishmael.Munene@nau.edu](mailto:Ishmael.Munene@nau.edu)

肯尼亚最近的高等教育融资改革是对自 2010 年以来困扰该行业的资金危机的回应。这些改革不仅旨在解决系统性增长、学生入学人数激增以及教育质量等问题，还试图解决学生融资和教育机构财务可持续性方面的公平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改革也标志着市场机制未能成为高等教育资金的可行替代方案，而这一点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改革中曾被设想。尽管当前的改革预示着大学教育资金领域的范式转变，但它们未能解决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高等教育资金可持续性等重要问题。

非洲国家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面临新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政策的后果，这些政策旨在解决国家资金短缺的问题，体现为大学的大众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许多国家采用的模式是将私人资源、市场收入和政府补贴相结合，试图维持并促进系统性扩展。学生及其家庭不得不部分或完全承担费用，大学被期望通过自身创造收入，而政府则为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补贴。然而，本文讨论的肯尼亚经验为市场和私有化作为大学资金来源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并揭示了在保持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如何解决大学资金和公平问题的挑战。这一关于肯尼亚的讨论不仅对于非洲背景意义重大，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大学资金和公平问题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在政府资金、私人分摊、市场收入和教育质

量之间寻找平衡至关重要。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改革

受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启发，肯尼亚的改革通过将国家大学转变为由政府拥有、但主要由私人资助的机构，回应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非洲结构调整计划。政府引入了分担成本的措施，学生每年支付 106 美元的低价学费，并为那些无法支付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此外，学生还需自费支付校园内的生活费用。然而，由高等教育贷款委员会 (Higher Education Loans Board) 管理的贷款计划为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财政支持，帮助他们支付住宿费。这些措施仅适用于政府资助的学生——即那些根据高中成绩获得政府奖学金的学生。高等教育贷款委员会是一个完全由政府资助的国家公司，旨在为个别学生提供高等教育资助。

这些改革引入了高等教育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国家大学被允许接收私立资助的学生 (即“模块 II”)，这些学生支付全额学费，从而为大学创造额外的收入。大学还被要求开展创业活动，以补充政府资助。此外，私立大学的设立旨在扩展高等教育机会。这些干预措施导致了系统性的大规模增长。2000 年时，大学数量为 18 所 (6 所公立，12 所私立)，到 2010 年增加到 60 所 (22 所公立，38 所私立)，2023 年为 69 所 (39 所公立，

30 所私立)。在入学人数方面, 2000 年为 45,412 人(公立 38,413 人, 私立 6,999 人), 2010 年为 182,253 人(公立 150,926 人, 私立 31,327 人)。目前的在校人数为 563,000 人(公立 426,965 人, 私立 85,946 人)。

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公立大学融资产生了不良后果。预计的来自创业活动的收入增长未能实现, 虽然最初私立资助学生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 但随后迅速下降, 导致公立大学陷入财务困境。此外, 为了保障大学教育质量, 政府于 2015 年禁止建立公立大学的分校校区, 并将政府资助的学生与私立资助的学生合并, 以确保课程的一致性——这些措施进一步限制了“模块 II”计划的收入增长渠道。此外, 在为公立大学和学生提供资金时, 政府对学术项目的定价未考虑到其实际交付成本。在当前的改革之前, 公立大学的总债务已超过 110 亿美元, 严重影响了它们的运营。政府的资助持续下降; 例如, 在 2019-2020 财政年度, 政府的资助削减了 3 亿美元。

### 新的高等教育资助模式

根据这一模式, 公立大学不再直接由政府资助, 而是通过新设立的大学基金获得资助。大学基金是一个公共信托机构, 负责制定机构资助标准和拨款, 并发放所有政府资助。该基金还根据感知的交付成本来为学术项目定价, 这也决定了可供学生的贷款和财政支持。对于学生资助, 将采用收入测试将学生分为四个类别, 提供不同级别的财政支持, 包括政府奖学金、贷款和家庭贡献。这些类别包括: 弱势群体(82%奖学金, 18%贷款)、极度贫困(70%奖学金, 30%贷款)、

贫困(53%奖学金, 40%贷款, 7%家庭贡献)和较少贫困(38%奖学金, 55%贷款, 7%家庭贡献)。这些财政支持将通过高等教育贷款委员会提供。目前, 肯尼亚的高等教育资助有两条途径: 大学基金为公立大学提供资助, 而高等教育贷款委员会则为包括私立大学在内的个人学生提供资助。

这些改革引发了严重的忧虑。它们没有提到加强政府资助以满足公立大学的经费需求, 而这一点是当前其财务困境的主要原因。如何确定将学生归入哪个类别, 仍然是一个挑战, 尤其是在一个大多数家庭生活困难、许多人从事非正式部门工作的国家, 收入可能很难被捕捉到。那么, 如何界定“弱势群体”、“极度贫困”、“贫困”和“较少贫困”呢? 通过根据项目成本差异化学费进行价格歧视未能认识到, 提供一个项目的成本可能会因机构所在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值得注意的是, 位于相同地点的私立大学对于类似项目采用不同的定价模式, 从而提供了公立大学没有的选择。实际上, 政府资助的学生是否可以在私立大学就读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解决。

### 结语

仅仅通过针对学生公平性进行高等教育资助重构, 并通过价格歧视反映项目成本, 无法有效解决由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大学资助挑战。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 涵盖政府资助、机构预算和员工合理化、可持续的系统性扩展(避免政治短期行为)、质量控制以及私人资源的范围等方面, 才能为这一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 更高的学位还是更高的抱负？英国艺术与人文学科博士的新路径

克里斯托弗·史密斯

克里斯托弗·史密斯 (Christopher Smith)：英国艺术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执行主席、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教授

电子邮箱: cjs6@st-andrews.ac.uk

博士学位是一个与声望紧密相关的学历资格，但鲜少受到深入研究。尽管博士学位在成果、形式和过程上变化不大，其背景已发生显著变化。英国现代博士学位通常被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它是我们教育体系中的相对“晚辈”，而通过“博洛尼亚进程”形成的三周期教育体系（本科、硕士、博士）则出现在 20 世纪末。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招生时，认为博士学位是进入许多职业的途径，而不仅仅是学术岗位。毫无疑问，成功的博士生确实会从事多种工作。然而，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博士学位是否是进入某些职业的必要步骤，还是一个边际附加价值较小的选择。很多私人实验室的研究与开发岗位可能要求具备相关的博士学位，而进入公务员、学校教学、出版、商业、智库等领域则未必需要博士学位。

这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

我们能否确定博士学位是否为非学术领域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并且它是否适应了我们赋予它的更广泛目标？

如果这些技能不能通过传统的政府市场失灵理论来获得，那么我们如何评估通过艺术与人文学科高层次学习所培养的技能？

应该投入多少公共资金用于什么类型的艺术与人文学科博士学位？

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尤其是在公共讨论中，艺术与人文学科的价值时常受到质疑。我们都不愿轻易触及那些可能揭开更多问题的线索。然而，忽视这一点可能会让我们错失现在真正需要展开的关于艺术与人文学科博士学位的辩论机会。

### 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是否适合其目的？

我们不能仅仅假设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完全适合其目的。随着实践基础研究的增加，博士学位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但同时，也不应将艺术实践仅仅局限于博士学位的框架内。此外，一些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更接近于职业博士资格，这在一些领域（如商业）可能比在艺术与人文学科中更为明确。我们很难明确界定我们真正期望博士学位提供什么，而我们需要将这些期望与重新构想的博士学位能够提供的更广泛的技能组合联系起来。

经典的博士学位可能有许多形式的论文，但现存的博士学位模式远不止这些，还有许多直接介入公共领域的模式。博士学位作为社会创新和创意干预的途径，并不取代对现有学术贡献的扎实工作，但它也未必与之截然分开。它可能对候选人提出很高的要求，同时展示学位培养的技能类型，也是对

可能获得的资助类型的一种论证。

## 艺术与人文学科博士学位的公共资助

不同国家对博士学位的资助方式各不相同。但只有公共资金才能为所有人打开机会，而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在其资助的所有领域中，投入到博士学位上的资金比例是英国任何其他研究委员会中最高的，尽管它依然只支持系统中大约 10% 的艺术与人文学科博士学位。

在 2020~2021 年期间，英国约有 1.8 万名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博士候选人。与部分科学领域的情况正好相反，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在供需之间存在差距，某些科学学科领域要求博士学位的工作职位甚至超过了供给。然而，如果我们要求每一项公共资助的博士学位都能展示其对社会的影响路径，正如我们假设研究及其他应用路径中已嵌入了影响力，这可能是有益的。艺术与人文学科博士学位潜在技能集合的更广泛和更积极的定义明确表明，应该有多种资助途径。

或许有两个具有挑衅性的问题：首先，如果给予鼓励，有多少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持有者会发现将其学术成果融入更具创新性的模式并非难事？如果他们确实感到很困难，我们是否应该审视他们正在获取哪些技能？如果我们将博士学位的定义重新构想为在公共领域共同创造严格且有效的创新，那么是否可以获得更多的资助？如果将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框定在这些条款下，它的学术形象和就业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

第二，如果我们达成共识，认为我们的博士学位应当更开放，鼓励更多创新性和跨领域的工作，但当前的模式不适合，难道我们不应该审视这个模式吗？一个适当资助且

真正整合的五年或六年项目，结合硕士学位，应该是什么样子？海外的模式在这里可能会有所启发。

更进一步来说，博士学位的指导和审查过程相对未曾改变。英国目前推动一致的双重指导是值得推崇的，但在不同类型的机构之间进行管理一直是一个难题。我们是否应该为此提供更好的激励？不同形式的审查是否能为成功提供不同的途径？我们是否应该设立一个负责审查的、更具雄心壮志的博士指导小组？如今，博士学位是唯一一个依赖两个人在封闭房间内面试而定期授予的学术资格。为什么我们的最终审查不能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公开，确立博士学位成果作为公共知识的概念呢？

## 振兴“研究生艺术与人文学科”的概念

我们可以更好地论证这一点，特别是如果我们更加努力地展示与我们思考和想象世界相关的各个行业的广度。那么，我们的制药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等价物是什么？我们能否做更多的工作，探索并解释组合型博士学位（portfolio PhDs）和非连续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产生类似于通过发表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效果，但它们是通过多个项目逐步实现的？或者，如何探索政策和社会创新领域的博士学位，尤其是与社区共同创造的博士学位？我们如何将博士学位恰当地嵌入到地方、再生和机会之间发展的关系网络中？团队型博士学位的模式是什么？我们应该探索哪些资助创新？我们如何从支付学费转向创造价值？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是否真的有助于成为迈向真正市民大学的关键一步？我们如何重新构想艺术与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可以进行的实验室，不仅是为少数获得资助的人，而是为更广泛和更多样化的群

体？

艺术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将继续支持合作型博士学位，以此推动在英国范围内广泛分配跨学科的学生资助，并为卓越中心提供有针对性的竞争性资金。然而，仍然有更多工作需要做。成千上万的无人问津的博士学位论文不是解决方案。一个真正雄心勃勃的项目，通过振兴研究生艺术与人文学科的

概念，可能会产生变革性的影响，不仅在英国，也在其他地方。

注：更多详情请见由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发布，作为其常规博客的一部分。

## 博士政策治理的演变：国际组织影响力的发展

提勒·托尼斯曼、马修·拉丰

提勒·托尼斯曼 (Teele Tönismann)：博士跨学科研究实验室、Adoc 人才管理公司的研究员、  
法国图卢兹政治学院社会科学实验室 (LaSSP) 成员

电子邮件：tonismann@adoc-tm.com

马修·拉丰 (Matthieu Lafon)：博士跨学科研究实验室、Adoc 人才管理公司的主任

电子邮件：ml@adoc-tm.com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特别是自博洛尼亚进程引入由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组成的三周期高等教育体系以来，各国政府逐渐加大了对博士教育的关注，而博士教育曾经主要被视为学术界的事务。

然而，还有另一个趋势较少被充分记录：即国际上，尤其是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以下简称为经合组织) 等国际组织对博士培训的日益重视。本文将探讨国际组织的最新政策倡议，并认为，这些组织在塑造研究生涯战略中的参与，正在改变博士政策的制度治理框架及其内容。

### 博士政策在科研职业规划战略中的兴起

要全面理解国际组织近期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回顾博士教育如何首次融入科研政策议题之中。

以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为例，这一案例极具说服力，因为它展示了从 2000 年代初开始的一个相当复杂的制度化过程。一方面，博士教育问题首次在国际层面上获得关注，是在博洛尼亚进程以及随后的欧洲高等教育区建立的背景下。这一备受讨论的政府间倡议旨在改善大学之间的合作、提升质量、促进流动性并提高毕业生的

就业能力。博洛尼亚进程除了在这些领域对博士教育产生积极影响之外，还推动了大学现代化议程，这一议程尤其得到了作为签署方和执行成员之一的欧洲委员会的倡导。

另一方面，博士教育在所谓的欧洲研究区 (European Research Area) 政策框架内也获得了发展动力。欧洲研究区是欧洲委员会于 2000 年启动的一项政策倡议，目标是使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知识型经济体”。欧洲研究区推动了欧洲委员会研究政策的显著增长，包括增加资金、增强工具以及在社会挑战和研究卓越方面的全新政策重点。欧洲委员会致力于建立单一市场，这凸显了对研究职业生涯采取更有组织方法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2005 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研究人员欧洲宪章》 (*European Charter for Researchers*) 和《研究人员招聘行为守则》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Recruitment of Researchers*)。虽然博士候选人仍被归类为学生 (因此隶属于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公共政策)，但他们现在被定义为“早期职业研究人员”，从而将研究职业政策与博士培养项目联系起来。

因此，通过认可博士生的工作和地位，这一分类变化使欧洲委员会得以确立其在博士领域的权威。自那时以来，在包括 2009 年

《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在内的各种政策倡议的推动下,欧洲委员会不断推动创建新的博士项目、建立联盟并促进研究领域的跨部门流动性。《里斯本条约》将研究政策确定为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共享权限,自此,欧洲委员会在博士教育领域不断推出新举措。

## 博士学位的市场化

将博士候选人归类为早期研究人员对国际组织中的博士政策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最近的政策举措便是这一影响的良好例证。

2023 年夏季,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推出了与促进研究人员职业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博士生的职业生涯发展。首先,欧洲委员会提出了一套全面的措施,其中包括建议制定“欧洲研究人员职业发展欧洲框架”的理事会建议、创新的《研究人员宪章》(Charter for Researchers)和《研究人员欧洲能力框架》(European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Researchers, 简称 Research Comp),旨在促进研究人员的跨部门流动性。其次,经合组织和欧洲委员会共同发布了一份文件,概述了即将建立的《研究与创新职业发展观察平台》(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reers Observatory)的基础概念,并进一步通过经合组织的建议,推动为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提供多样化的职业发展路径。

这些倡议主要聚焦于研究人员的职业发展,因此与博士生涯息息相关。此外,在探讨研究人员的职业生涯时,它们为博士培训建立了一个具体框架,政策行动应在此框架内展开。简而言之,政策文件在其主旨叙述中突出了对研究人员(包括博士生)支持严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向学术界以外的各

个就业领域过渡时。文件提出,博士学位应直接并无缝地为就业市场做出贡献。例如,在拟定的欧洲研究生涯框架中,国家被敦促“鼓励学术界、工业界、其他商业部门、公共行政部门、非营利部门以及所有其他相关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之间进行互动与合作,包括伙伴关系”,并确保“博士培训及有针对性的培训应基于各方实际技能需求进行开发或共同开发。”因此,博士教育的本质似乎不再局限于学术好奇心,而是超越了培养未来学者的传统职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工具和推动力。这种推理是现代新自由主义治理逻辑的典型特征,倡导国家在社会各个方面实施与市场相关的改革。

因此,在市场逻辑框架下,这些举措不仅仅是完善博士生涯轨迹的技术框架。它们还引入了认知维度,重新调整了社会对博士学位的认知,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广泛框架内。

## 软法规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最后,以上所描述的变化也引发了关于其对国家政策影响的讨论。

总体而言,政策建议、政策工具(如《研究人员欧洲能力框架》)和基准工具(如《研究与创新职业发展观察平台》)可以被视为“软法”措施,这是国际组织中常用的治理方法。该方法的主要目标是传播共同的政治目标和认知原则,而不是完全的政策统一或自上而下的实施。因此,软法更多依赖于模仿和同行评估,而不是正式的约束;它们允许不同国家对共同问题做出不同的响应。然而,据我们所知,关于博士培训的国家案例研究仅偶尔与国际组织层面上不断发展的政策建立联系。然而,考虑到欧盟和经合组织之间在政策模式和学术文化上的差异,这一

点至关重要。

理解国际组织的行动对于认识博士政策治理结构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这使我们能够关注博士培养角色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往往在更公开的关于研究生涯的讨论背后悄然发生。在就业市场要求提高就业能力的背景下，单一地强调就业市场的相关性可能会限制教育的更广泛目标，特别是在博士学位这样的高级课程中。

全面的教育一方面为博士生提供专业技能，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适应、创新并为社会做出有意义贡献的能力。因此，博士教育应寻求平衡，结合市场导向的实用技能与人文学习的基础。这种方法确保毕业生不仅能为就业市场做好准备，还具备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的智力广度。这样的综合教育不仅有利于个人，也能通过培养全面、具有社会意识的专业人士和学者来丰富社会。

## 国际学生流动、机会与迁移的自愿性：一种新的概念性方法

丽莎·鲁思·布鲁纳、伯恩哈德·斯特雷特维泽、拉吉卡·班达里

丽莎·鲁思·布鲁纳 (Lisa Ruth Brunner)：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移民研究中心博士后

电子邮件：lisa.brunner@ubc.ca

伯恩哈德·斯特雷特维泽 (Bernhard Streitwieser)：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教育与人类发展研究生院副教授、难民教育进步实验室主任

电子邮件：streitwieser@email.gwu.edu

拉吉卡·班达里 (Rajika Bhandari)：美国班达里公司创始人

电子邮件：rajika@rajikabhandari.com

国际流动的学生常常被视为相对同质化的群体，拥有共同的动机和经历。然而，高等教育、流动性与（移民）迁移之间不断变化的互动关系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这一过时的观点。

随着全球北方高等教育系统越来越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政府也将这些学生视为未来“理想”移民，当前高等教育已经嵌入了一个日益加深的教育与移民的联系之中，或称“教育移民”（*edugration*）纽带中。高等教育机构还为难民保护提供了全球化的途径，这也是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所发布的《全球难民契约》（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日益关注的重点。这些变化以及其他转变为跨学科研究国际学生流动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 国际学生流动的“混乱性”

国际学生流动指个人为了获取学术经验而前往他国的物理流动。然而，这一现象长期以来在迁移研究领域未得到足够关注，在国际教育领域也缺乏深入的理论化和批判性

探讨。近年来，这一主题逐渐成为这两个领域的重要议题，而相关研究也揭示了其中的复杂性和挑战。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合作伙伴关系结构的演变，界定“谁是国际学生”变得愈发困难。此外，将国际流动性研究优先于国内流动性研究的做法，引发了关于跨越通常具有殖民色彩的国家边界的独特性问题。国际学生流动的动机和经历极为多样化，使得以简单的方式对其进行分类几乎不可能。正如汉斯·德·维特对“国际化”这一术语中“问题性模糊”的批评，我们认为国际学生流动也同样面临相互交织的“混乱”问题。要全面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更细致和批判性的视角，同时正视其不同背景下的多维特性。

### 混乱的术语

术语在组织和传达价值观时具有话语意义。与国际学生流动相关的术语不仅使用不一致，它们还掩盖了（移民）迁移的复杂性和权力关系。例如，随着“教育移民”（*edugration*）的扩展，区分国际流动的“学生”、“移民”和“难民”变得越来越困难。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基础且可以说过时的“难民”法律定义, 也越来越受到批评, 认为它服务的是国家的需要, 而不是迫迁移民的需求, 并排除了一些更广泛的迁移模式, 诸如气候危机引发的流离失所。

术语在组织和传递价值观中具有话语意义。与国际学生流动相关的术语不仅使用不一致, 还掩盖了移民中固有的复杂性和权力关系。例如, 随着“教育迁移” (edugration) 的扩展, 越来越难以区分国际流动的“学生”、“移民”和“移居者”。此外, 联合国难民署对“难民”的定义因其欧洲中心主义且显然过时的法律解释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这种定义更多服务于国家的需要, 而非被迫迁移者的需求, 并排除了更广泛的迁徙形式 (如因气候危机导致的流离失所) 所需的保护。

## 混乱的数据

国际学生流动相关的数据在各国之间存在差异, 不同的类别可能会被混淆, 从而使国际比较和公众讨论变得复杂, 而且这些数据通常是不完整的。例如, 关于国际学生转为永久居民的统计数据缺乏, 阻碍了对“教育移民”模式的理解。与此同时, 从事教育的难民往往不被算作国际学生, 因此被单独列出并单独理论化。

## 混乱的实践

高等教育机构在学费评估、奖学金资格和其他行政目的上粗略地区分国际流动学生的类别。具有移民背景的“本国”学生被随意地与国际学生区分开, 而那些没有合法身份、无国籍、跨境原住民国家成员或其他无法轻易归类的人, 则挑战了“国内/国际”二

元分类。同时, 寻求庇护者和刚刚重新安置的难民可能被视为“本国”学生, 但他们需要“国际”学生服务, 这进一步复杂化了学生事务和资助模式。

## 重新定义国际学生流动

我们认为, 国际学生流动与迁移的交织所导致的“混乱”部分源于缺乏对其的细致分析方法。为此, 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两个关键概念的新理论框架。

第一个概念由施特赖特韦泽 (Bernhard Streitwieser) 提出, 将国际学生流动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别。第一类是“启蒙流动” (mobility for enlightenment), 即自愿的国际教育。第二类是“机会流动” (mobility for opportunity), 即由经济迁移驱动的国际教育。第三类是“生存流动” (mobility for survival), 即被迫迁移的国际教育。

第二种方法由厄尔达尔 (Marta Bivand Erdal) 和奥本 (Ceri Oeppen) 提出, 强迫迁移和自愿迁移间具有连续性, 而非对立的二元选择。

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 我们识别出国际学生流动的两个结构性要素: 首先是“流动的自由度”, 即流动的自愿性; 其次是“流动对机会本身的影响程度”。

## 流动的自由度

自由度通常被视为迁移中的一个明显区别: 难民被迫迁移, 而国际学生具有自主性。然而, 我们认为国际学生流动中流动的自愿性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连续性概念, 包含多种不同程度的自由度。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确保在国际学生流动的分析中纳入难民、被迫迁移的个体以及其他流离失所的学生, 并认识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及

当代力量对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以及它们对流动自愿性的影响。

### 通过流动获得机会

国际学生流动通常被讨论并运用在其为个体带来的经济效益层面。但在关于国际学生流动的讨论中，常见的观念，如向上流动和布尔迪厄 (Bourdieu) 的资本理论，往往过于简化。我们建议也应将机会视为一个连续性概念，从而为各种可能的机会程度——无论是教育机会还是其他机会——留下空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到国际学生流动的相对性，即社会标记不是静态的，而是通过流动不断 (再) 生产的，“机会”的概念具有高度的情境性。

### 自由度与机会的交界

在重新定义中，国际学生流动的结构由这两个谱系的交界决定：自由度和机会。换句话说，“流动的自由度”与“通过流动获得机会”在重要且多样的方式上交叉，从而形成了国际学生流动可能呈现的更广泛的形式集合。

例如，在横向学分流动中，不同国家之间相似排名的机构进行交换，且这些国家的 GDP 相近，参与国际学生流动通常是相对自愿的，对机会的影响也相对边际。学生的社会或文化资本可能会增加，但他们的国际参

与是自愿的。然而，在“教育移民”中，移民成为了一种特定的社会流动形式，通过进入新劳动市场和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由于国民经济的不均衡，学生的流动自由度受到更多制约，而这种流动对他们的机会影响可能更为显著。最后，在被迫的国际学生流动中，难民学生因必要或逃避迫害而加入流动，流动对其机会的影响可能更为巨大。

通过观察这些广泛的行动自由和机会模式，我们重新定义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个体和情境的差异始终存在，因此，我们强调应将行动自由和机会视为两个交叉的连续谱进行理解。

### 需要改变的地方

随着国际学生流动的社会功能在全球迁移背景下发生变化，学者和从业者都需要重新思考他们用来应对这一日益混乱的术语、数据和实践的概念工具。重新思考意味着，我们当前的数据提供者，如国际教育学院的《开放之门》年报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需要重新设计如何汇总数据，这些数据是国际教育和难民研究等不同领域研究人员依赖的。如今，我们不能再将被迫迁移者排除在国际学生流动讨论之外，也不能再假设国际流动总是与向上流动相关联。

## 新冠疫情后日本和韩国的国际学生政策

石仓由纪子、卓然洙

石仓由纪子 (Yukiko Ishikura)：日本大阪大学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副教授

电子邮件：ishikura@ciece.osaka-u.ac.jp

卓然洙 (Yon-Soo Tak)：日本大阪大学学生成功研究与实践中心教授

电子邮件：yonstak.slics@osaka-u.ac.jp

吸引国际学生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努力的核心。尽管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英语国家一直是国际学生的主要目的地，但日本和韩国等非英语国家通过政府倡议，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并吸引国际学生。日本设定了到 2020 年吸引 30 万国际学生的目标，韩国则计划到 2023 年招收 20 万名国际学生。这两个国家成功实现了各自的目标。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首先中断了学生的流动性，随后又改变了国际学生的流动趋势。尽管如此，疫情也为国际学生市场带来了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因此，疫情后时期成为高等教育机构重新审视如何吸引国际学生的关键阶段。本研究旨在探讨日本和韩国如何通过政府倡议，在疫情后努力重新吸引国际学生。

日本和韩国的政府在推动国家国际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两国都经历了严重的出生率下降（截至 2022 年，日本为 1.26，韩国为 0.78），导致大学生人数减少。因此，小规模的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高校，面临着难以填满招生配额甚至破产的困境。在日本，2023 年有 53.3% 的私立大学难以完成招生任务；在韩国，自 2000 年以来已有 20 所大学关闭校区，其中 19 所位于首尔以外的农村地区。因此，吸引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包括国际学生，成为日本和韩国政府

的重要举措之一。

### 日本的国际学生政策

2008 年，日本推出了“30 万留学生计划”，目标是在 2020 年前吸引 30 万名国际学生。该目标在 2019 年提前一年实现。然而，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国际学生数量在 2022 年下降至约 23 万人。因此，政府于 2022 年 6 月宣布，将致力于推动日本高等教育机构从这一急剧下降中恢复，力争到 2027 年恢复到疫情前的留学生数量。

在此背景下，政府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推出了全新的国际化政策，即“流动与国际化：重新参与与加速培养未来一代”的倡议（简称 J-MIRAI）。该倡议设定了到 2033 年实现的双重目标：吸引 40 万名国际学生赴日学习（其中 38 万为大学和日语学校学生，2 万为高中生），并派遣 50 万名日本学生赴海外学习（包括 15 万名攻读学位或参加长期学分项目的学生，23 万名参与大学中期和短期项目的学生，11 万名参加三个月以下短期项目的学生，以及 1 万名高中阶段参与三个月以上项目的学生）。

与以往侧重高等教育的政策不同，这一新倡议为各个教育阶段设定了具体目标，从中等教育阶段开始进行规划。此外，该倡议还旨在超越单纯增加国际学生和日本学生流

动数量的目标，更注重提升学生的质量、教学与学习水平、学术服务以及支持基础设施的质量。

同时，政府提出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需紧密合作，为学生从学术界到日本职场的无缝过渡提供保障。此举有望将国际学生在日本毕业后的就业率从 2018 年的 48% 提高到 2033 年的 60%。

## 韩国的国际学生政策

2012 年，韩国政府启动了“韩国留学 2020 项目”，旨在到 2020 年前吸引大量国际学生。然而，该目标年限被延长至 2023 年。截至 2023 年 6 月，韩国成功吸引了 207,125 名国际学生，实现了目标。然而，由于疫情的影响，国际学生人数一度出现下降。2023 年 8 月底，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国际学生政策——“韩国留学 30 万项目”，以进一步推动国际化进程，并计划到 2027 年将国际学生人数增加至 30 万名。

这一新政策的目标是扩大国际学生数量，帮助优秀学生在完成高等教育后定居韩国，并提升韩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计划扩大“全球韩国奖学金”（Global Korea Scholarship）项目的规模，重点支持在首尔地区以外学校学习 STEM 领域的学生。此外，政府还放宽了留学韩国的语言和签证要求，增加了英语授课课程，并为获得特定科学技术领域高等学位的学生提供更便捷和快速的永久居留途径。

与日本的情况类似，韩国的国际学生在完成高等教育后往往选择离开韩国。据韩国国家统计局数据，62% 的国际学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因此，韩国通过实施这项新政策，旨在减少技术型人才的外流，保留更多高技能专业人才。

## 挑战与关注

疫情为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开发新方法和策略的契机。如今，随着国际学生流动性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日本和韩国正以全新的政策和举措重新进入不断变化的国际学生市场。在回顾过去的国际学生政策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两国明确了新的目标，准备在新的国际学生市场中发挥作用。

从历史来看，国际化政策更倾向于强调数量，例如国际学生人数，而非质量。新的政策举措则力图在数量和质量之间找到平衡。然而，由于这些政策的目标是在特定年份内达到一定数量的国际学生，关于教育质量和学生质量的担忧仍然存在。

国际化曾经是高等教育机构的专属战略，而如今，它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关切。两国都希望吸引优秀的国际学生进入其高等教育机构，并在毕业后将他们留在本国生活和工作。要想有效实施这些新的国际学生政策，就必须认识到，高等教育机构不能单独作为国际化的唯一推动者。一个涵盖产业、学术界和政府的协作模式至关重要。为了确保国际学生从学术界到商业社区的无缝过渡，来自这两个领域的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国际化努力方面，城市和农村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存在差距。城市机构通常比农村机构更能吸引本地和国际学生。因此，城市和农村的高等教育机构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挑战，制定不同的国际化策略。

日本和韩国在国际学生政策上面临相似的挑战，并共享共同的目标。两国需要从单纯争夺国际学生转向共同吸引学生到东亚地区的合作。它们可以相互借鉴经验，共同努

力吸引国际学生来到这一地区学习和发展。 (JSPS KAKENHI, 项目编号 23K02525) 的  
资助。

注：本研究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

## 中国学术人员制度改革：轨迹与矛盾

李琦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件: qli@bnu.edu.cn

2021 年 6 月, 上海一所大学发生了一起校园凶杀案, 引发了公众对学术界终身教职制度的情绪和讨论。媒体报道, 嫌疑人是一名数学系教师, 因其未能成功续签三年期合同, 杀害了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在此之前, 嫌疑人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并在美国的两所著名研究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了若干年的博士后研究, 随后回国并在另一所大学工作了三年。

尽管这样的悲剧极为罕见, 但它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源管理中出现的两个主要的同质化变化。一方面, 变化的轨迹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同质化趋势。复旦大学及其他一些顶尖高校采用终身教职制度, 既表明这些学校有足够的资源来实行和维持该制度, 也表明它们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地位时需要这种制度所提供的制度合法性。毕竟, 北美的高等教育一直是全球羡慕的对象。然而, 另一方面, 变化的轨迹也受到独特性的牵引, 这种独特性主要源自政府指令、院校要求以及地方文化与传统。我们有必要问自己, 为什么终身教职制度会引发杀人事件, 并激起公众的情绪和反感。如果终身教职制度仅仅被视为经济安全与个人满足一定数量/水平要求(如论文、奖项、科研项目 and 人才称号)的权衡——这种现象在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中屡见不鲜, 那么该制度可能已偏离了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初衷。显然, 终身教职及

其他学术人员管理制度改革, 对关心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受众来说, 具有重要性和现实相关性。

### 发展轨迹

从理论上讲, 在过去四十年的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中, 逐步发展出三种模式, 转变了教师与其所在机构之间的关系。这些模式从基于职业生涯的“干部身份”模式, 演变为基于岗位的“公共合同”模式, 再到当前的“双轨制”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中, 教师持有干部身份, 一旦被聘为常规教师职位便获得永久性任用。在第二种模式中, 教师以固定期限合同受聘, 职位基于岗位需求且竞争驱动。在第三种模式中, 基于岗位的公共合同模式与终身教职模式共存, 尤其是在高层次院校中更为明显。然而, 已有文献表明, 在一些相关司法判决中, 劳动法与合同法理论之间存在不匹配的现象。

从时间轴上看, 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的四十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试验期(1985-1993 年)。**在此阶段, 高校聘任制度逐步从国家权力导向向市场导向过渡。1986 年, 政府出台了两项政策, 要求高校实施教师聘任制, 设定由国家支付薪酬的岗位编制等规定。

**第二阶段: 巩固期(1994 年起)。**人事管理开始从国家权力模式向合同制模式转变, 个人的业绩与奖励与制裁、升迁与降职、

聘用与解聘挂钩。

第三阶段：追求学术卓越的阶段（1998 年起）。超过 100 所高校实施了终身教职，同时保留了基于岗位的公共合同模式，通过“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协调双轨制体系。

## 矛盾

总体而言，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的四十年历程改变了教师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增强了高校在人事决策中的自主权，促进了工作场所竞争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并提升了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然而，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需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以下几个矛盾和问题。

第一，制度价值与实际落实之间的不一致。高校声明的价值观与实际执行效果之间的差距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矛盾。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库统计，2007 年至 2020 年期间，与高校教师人事纠纷相关的民事案件约有 168 件。诉讼原因包括辞职争议（占 37%）、劳动合同纠纷（占 36%）、解雇纠纷（占 25%）以及聘任合同纠纷（占 2%）。除民事诉讼外，还存在针对高校提起的行政诉讼。然而，由于“穷尽救济原则”的约束，许多潜在的教师原告无法对高校提起行政诉讼。归根结底，高校与个体之间的不契合导致一些教师感到被剥削，另一些教师则可能反过来利用高校，甚至出现双方互为受害者的情况。

第二，教师分层现象。教师分层也是需要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自 1993 年以来，在

政府主导的人才计划推动下，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在顶尖高校中形成了四个层级的教师群体，即：拥有特定人才称号的教师；具有终身教职的教师；无终身教职但由国家支付薪酬的教师；以及无终身教职且不由国家支付薪酬的教师。其中，第三、第四层教师的数量远远多于第一、第二层教师，但后者的薪酬通常高于前者。虽然这一政策和实践有助于吸引特定类型的人才，但却未必能够发现和激励那些潜在的未知人才，也未必能有效激励大多数教师的积极性。

### 第三，学术近亲繁殖

学术近亲繁殖是需要关注的另一问题。尽管学术近亲繁殖可能会限制选聘最佳候选人的范围、强化工作场所中的层级关系，并加剧不公平的权力问题，但这种现象仍然存在于一些高校中。通常，学术近亲繁殖的教师是指在所在高校获得博士学位并与校内拥有合法权力的个人存在私人关系的教师。这些教师往往被期待忠于某个领导群体，而这个群体通常与其他群体（或个体）竞争。不可否认，学术近亲繁殖容易将学术单位变成政治单位，在这样的环境中，权力、联盟和关系网络往往被置于诚信、公平和卓越之上。

## 结语

四十年的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发展。为了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与变革，以改善高校声明的价值观与实际执行之间的脱节，发掘并激励潜在的未知人才，激发大多数教师的积极性，并将同事间的协作关系转化为真正的团队精神。

## 前苏联国家大学治理的背景

彼得·D·埃克尔

彼得·D·埃克尔 (Peter D. Eckel)：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教育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全球高等教育管理新项目的学术负责人

电子邮件：eckelpd@upenn.edu

大学治理的机构层面是政策意图转化为行动的机制。治理结构决定了哪些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如何聚集，包括谁能够获取什么信息，决策如何做出并传递。大学和政府所创建的治理结构各不相同，没有一种单一的模式适用于所有情况。随着世界各国的大学在重新考虑治理时，通常采用西方风格（并由顾问主导）的模式，它们应该如何思考治理结构的设计？哪种模式适合其所处的背景？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前苏联国家经历了一场独特的实验。1991 年，这十五个国家的大学拥有统一的、由国家规定的治理模式。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国家的治理方式因各种情况而发生了变化，四种不同的模式应运而生。首先是以学术为中心的模式，大学内部选举产生校长，治理机构的成员主要来自学术界和教职工。第二是政府扩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任命校长和治理机构的领导，并在治理和管理决策中扮演直接且重要的角色。第三是内外混合模式，治理机构的成员既包括来自大学内部的人员，也包括外部人员。最后是外部公民模式，其成员和领导来自大学外部，并代表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每种模式在不同国家内也有不同的变化。

虽然这四种模式本身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它们的运作效果如何？这种差异是否有意义？要回答这些问

题，需要记住，治理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应考虑其所处的运行环境。治理的有效性通常很难确定，因此，下一个更好的问题可能是关注治理结构与治理环境的适应性。

### 治理环境：自主性与竞争的结合

尽管这些十五个前苏联国家有着相同的起点，但它们现在在不同的背景下运作，从西向的波罗的海国家到内向的土库曼斯坦和白俄罗斯，再到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家。两大要素有助于说明治理的背景。第一个是自主性。自主性的差异将影响治理机构的职能、它们必须做出的决策，以及它们能够为大学提供什么样的支持。第二个要素是竞争。根据竞争的广度和深度，竞争会对大学及其治理机构提出不同的要求。大学是如何在学生、科研和资金上展开竞争的？后者聚焦于大学需要做什么才能繁荣发展，前者则关注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行动的权限。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 (Philippe Aghion) 及其同事认为，竞争和自主性是相互关联的：没有自主性的过度竞争意味着大学无法采取行动，而缺乏竞争的过度自主性则意味着大学可能会偏离社会需求，按照自己的意图发展。

我们的目标是生成一种关于自主性和竞争的感知。大多数人都了解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关于自主性的评分卡，它使得高等教育中的自主性

这一抽象概念变得具体。我们借助这个框架来理解治理环境中的某些方面。至于第二个要素，我们考虑了四个因素来构建一个平行的竞争指数。第一个竞争因素是学术研究。能够在国际期刊上获得认可需要学者进行与其他投稿竞争的研究，成功发表的研究即为竞争成功的指标。我们使用了国家层面的科研生产力评分（来自 Scimago 的高被引指数）。另外两个维度侧重于学生的竞争。一个是公立大学在国内与私立大学的竞争程度。私立大学招生的学生比例越大，说明系统内部的竞争越激烈。另一个维度关注国际学生的竞争，既包括吸引本国学生留在国内，也包括争取国际学生。对于后者，我们使用了国际流动性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基于这些数据创建了一个学生竞争比率。最后一个要素是通过竞争来获得学生支付的学费资金。针对这些维度，我们为每个国家创建了比较排名。

### 适当的治理模式（或不适当的）

上述维度提供了治理模式所在的框架，以下的一些印象浮现出来。

首先，在一些国家，竞争和自主性之间似乎存在不匹配。在多个国家，自主性与竞争的水平相符。例如，在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二者均处于较低水平。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竞争与自主性处于中等水平，而拉脱维亚则展现了中等偏高的自主性与竞争性。然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竞争似乎超过了自主性，而在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和立陶宛，自主性则超过了竞争性。这意味着政策环境对大学及其治理结构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要求。

因此，一些治理结构适应了当地的背景，

但并非所有的都如此。某些自主性和竞争性较低的国家采用了国家延伸型治理模式。国家主导高等教育，提供所需资源并限制竞争。然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治理模式似乎与背景不匹配。例如，俄罗斯采用国家延伸型治理模式，但它的竞争环境是中等程度且自主性较低的。这种治理模式可能会束缚大学在需要竞争时的灵活性。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都采用学术导向型治理模式，大学的治理侧重于内部管理。然而，格鲁吉亚处于竞争性高、自主性低的环境，而吉尔吉斯斯坦则处于竞争性中等、自主性低的环境，因此他们可能更适合采用允许更多外部关注的治理模式，比如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所采用的内外部结合型模式。三个位于波罗的海的国家都拥有中等到较高的自主性。拉脱维亚的竞争也较高。另两国，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竞争相对较少。它们都采用了内外部结合型治理模式，治理涉及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这可能恰好反映了它们的需求。然而，与哈萨克斯坦相比，哈萨克斯坦采用的最具外部导向的治理模式（包括政府官员等外部利益相关者），拉脱维亚的大学可能会从更外部驱动治理结构中受益，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其高竞争性和自主性。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这种治理模式的雄心或许有些超前，尚未适应当前的背景。

### 影响

有三点重要的启示。首先，在学术方面，竞争可以通过类似于欧洲大学协会自主性评分卡的更严格的指数来进行评估和提升。其次，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实施那些有意将竞争与自主性对接的政策。最后，大学领导应倡导建立一种结构，使他们能够以符合所在背景需求的方式推进治理工作。更好的背景与

结构的一致性将使治理机构能够以最有利、最有效和最高效的方式运作。一些过于集中化控制的结构在大学需要竞争时显得不足。而其他反映自主性但缺乏足够竞争保障的结构，可能会导致低效、使命漂移，甚至在极

端情况下引发腐败问题。

注：本文基于作者编辑的《后苏联国家的大学治理》（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年 10 月）

## 法国：“大学院”与“大学”之间的分界即将消失吗？

克里斯汀·穆塞兰

克里斯汀·穆塞兰 (Christine Musselin)：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Pari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教授

电子邮件：christine.musselin@sciencespo.fr

大学院 (grandes écoles) 与大学之间的区别是法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著名特点。它始于君主制时期，当时创办了桥梁与道路学校 (Éco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 1747 年) 和矿业学校 (École des Mines, 1783 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大学被废除，革命者选择创建新的学校 (例如综合理工学院或高等师范学院)。随后，拿破仑重新创建了大学院系，但高等院校部门继续发展，并获得了培养法国知识分子、经济和行政精英的声誉，而大学则接纳了大多数学生，培养了中层管理人员、教师和学者。

这一分界多次受到批评，但直到今天，这两个部门依然存在。尽管如此，近年来出现了两个重要趋势，使大学院与大学之间的距离有所缩小。那么，这一分界即将消失吗？

###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大学院的大学化”和“大学的职业化”

两个不同的过程缩小了两者之间在课程、活动和教职员工方面的差异。

第一个过程与政府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推动的“职业化”大学课程政策有关，即发展面向就业的课程。社会对大学培养学生进入职场的能力的期望不断提高，特定的“职业”学位在所有层级 (本科和硕士) 得以设立，企业实习也得到了广泛发展。近年来，学徒制的概念也已被引入法国大学。

与这一趋势并行，自 1980 年代中期以

来，最负盛名的商学院经历了重要的转型。它们模仿世界各地的同类机构，创建了海外校区，努力吸引国际学生，并争取获得 AACSB、AMBA 和欧洲的 EQUIS 等国际认证。然而，要获得这些认证，它们必须加速自身的内部转型，并遵循认证机构所推动的模式。这意味着，商学院不仅要招收一定数量的国际学生，还要招聘具有博士学位的国际学术人员。商学院不再聘用自己的毕业生作为长期教授，而是寻求更多具有学术背景的人员：拥有博士学位且有较强出版记录的教师。部分商学院甚至开始颁发自己的博士学位，研究成为了优先事项。它们因此引入了更多大学化的标准。工程学院虽然较晚采取了这一国际化转向，但如今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博洛尼亚进程加剧了这一趋同趋势：自此，大学院颁发的学位被称为“硕士”，与大学颁发的最终学位相同。

### 过去 20 年的改革浪潮

自 2005 年以来，法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更为结构性的转型。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在地方层面创建元组织来促进两大教育体系之间的合作，以便大学和大学院之间能够共同开展工作。因此，2005 年法律允许创建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 (pôles de recherche et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即成员机构可以在其中共同开发和管理联合实验室、联合教学项目，授予联合博士学位，并共同管理一些

专业领域的事务。到 2010 年初，法国已有约 20 个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但成员机构并未将太多事务下放至这一层级，共同项目依然较为稀少。

为了推动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的发展，政府决定只有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才能申请在法国的“卓越大学计划”（IDEX）申请，这一计划分别于 2010、2011 年以及 2016、2017 年再次启动。在 2010 年和 2011 年申请后，八个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包括波尔多、马赛、斯特拉斯堡、图卢兹和巴黎四周的四个中心）被选中并获得了额外资金。如果它们在四年后通过评估，便会被认定为“卓越机构”，并获得一个永久性的经费拨款来支持其预算。

这些申请的结果显示，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的过程对于那些既包括大学又包括高等院校的机构来说更加复杂。除了两个中心外，所有这些机构要么在 2010 和 2011 年的申请中未能成功，要么在四年后评估结果中失去了该计划的资助资格（如图卢兹和巴黎的某些中心）。此外，除了一个例外，所有获得 IDEX 认证的联盟在前四年内都经历了两三所大学的合并。通过模仿同样获得成功的模式，法国许多其他大学在首次申请后也进行了合并，但这些合并中并未包括任何大学院。

这一情况在 2018 年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所有被称为“大学”的法国高等教育机构都必须遵循 2013 年通过的《大学法》（University Act）规定。但在 2018 年 12 月，教育部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允许大学自愿不再遵循《大学法》。这些大学可以成为“公共实验学校”（public experimental institution），并自行定义具体的章程。该备

忘录还明确指出，如果公共实验学校是由大学与大学院合并而成，那么后者可以保留其法人身份。这为包括一些大学院在内的新一轮合并打开了大门。除了已经完成的合并之外，这一改革深刻地改变了法国的高等教育格局。

## 一场革命？也许是，也许不是！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如果这些近期的合并能够继续下去，它也充满了希望……但是，法国真的已经摆脱自 1747 年以来存在的依赖关系吗？

这一点并不确定，原因不仅仅是公共实验学校内可能会发生“离婚”。首先，当最著名的高等院校决定加入公共实验学校时，它们选择了没有大学的合作模式。例如，作为顶尖院校的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Polytechnique），它创建了一个由五所高等院校组成的公共实验学校。

此外，两个系统之间的学生竞争从未如此激烈。许多高等院校最近推出了四年制本科学位，允许学生在完成高中学业后直接进入学校（而不需要在准备两年后的高考后才能参加高度选拔的考试）。一些本科学位的学生可以随后加入这些高等院校的硕士项目。因此，这些学校的学生数量和学费收入都增加了。今年，私立院校的学生比例已达到 25%，而大学则首次经历了学生数量的下降！

由于研究潜力主要集中在大学中，大学在许多家长、学生以及法国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眼中仍然不如高等院校有声望。因此，虽然高等院校和大学之间的分歧受到了冲击，但它依然存在。

## 高校学生学术诚信问题的成因与应对： 基于俄罗斯和乌克兰高校的调查研究

徐昭恒、埃琳娜·德尼索娃—施密特、王 琪

徐昭恒：上海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电子邮件：zhx@shu.edu.cn

埃琳娜·德尼索娃—施密特（Elena Denisova-Schmidt）：

瑞士圣加仑大学（University of St.Gallen）研究员

电子邮件：elena.denisova-schmidt@unisg.ch

王 琪：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兼职副研究员

电子邮件：qwmichelle@gmail.com

在理论层面，腐败是一种易于被理解的现象，其基本定义是“滥用被委托的权力以谋取私利”。但在实践层面，它涵盖了一系列或许不那么容易被观测到的活动和现象，如贿赂、勾结、贪污、裙带关系等。学术诚信的缺失、欺诈以及其他形式的道德行为，是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普遍面临的腐败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大学历来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更因为青年一代的关键成长期主要是在教育机构中度过，他们在学生时代经历的任何学术腐败问题，都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未来在职场和个人生活中的行事作风，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学术失信或不端的理解和包容度却是不一样的。以政治名人博士论文造假或存在抄袭问题为例，在一些国家，涉事者可能只是被撤销学位；但在另一些国家，涉事者会因此背上品行不端的骂名，被迫终止其政治生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腐败一词往往与更显性的钱财问题关联，如窃取国家资金或贿赂决策者。在包括俄语和乌克兰语在内的许多斯拉夫语言

中，并不存在道德原则层面的（学术）诚信概念。

### 俄罗斯和乌克兰高校学术诚信问题调查

在针对乌克兰高校的一项研究中，将近 95% 的学生承认他们在测验和考试中存在作弊行为，超过 90% 的学生承认在撰写论文时抄袭了其他人的文章，60% 的学生反馈曾从互联网上下载过论文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论文提交，40% 的学生曾花钱购买过学期论文或课程作业，每三名学生中就有一人要求教师给予“特殊关照”。虽然这些行为发生的频率不同，但其普遍性令人担忧。同样令人感到忧虑的是，几乎一半受访学生承认他们在大学期间曾不同程度地贿赂过授课教师。

在另一项针对俄罗斯高校的调查中，研究者比较了一年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在学术诚信方面的经历。研究发现，随着在大学生学习时长的增加，学生对使用各种作弊手段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其中，承认“在考试中使用小抄和其他未经授权的材料”的学生数增加了 12%；“在考试或测验中抄袭”的学

生数增加了 25%；“从互联网上下载论文”的学生数增加了 15%；“从专门机构或其他学生那里购买论文”的学生数增加了 12.5%；“向教授提供欺骗性或误导性借口以解释糟糕学习成绩”的学生数增加了 11%。另外，数据分析结果也显示，毕业生比一年级学生明显更了解大学中的贿赂行为。

### 学生学术诚信问题背后的原因和动机

首先，弥补中学阶段学习不足。研究发现，一些学生选择作弊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中学教育阶段学习不充分或准备不足，难以应对大学学业要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中学教育机会公平性问题已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许多年轻人依赖课外辅导。这两个国家中大约有 60% 的学生请私人教师提供课后辅导；另外 40% 的学生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辅导，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负担不起高昂的辅导费。

第二，高校人才培养制度僵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多数大学在调整国家课程或允许学生选课方面不够灵活，客观上催生了作为应急对策的诸多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在这两国的高校中，年轻人通常需要在一个学期内修完一定数量的课程，对一些学生来说，其课业压力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尤其是那些需要通过兼职来维持生计的学生，他们不得不选择“捷径”来应对这些挑战。

第三，缺乏有关学术规范的常识。许多学生往往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调查数据显示，从公开来源“复制粘贴”文本信息在这些高校学生中被认为是一般学术论文的常见写作方式。即使是成绩优异的学生也会说“这只是理论”，或“这只是一本书故事情节或一部电影的情节。我为什么要引用

它”？事实上，在某些学术文化中，对“剽窃”一词有不同的概念，即某些材料被普遍认为是常识，比如，《圣经》就被认为是不需要用规范方式引用的。

第四，混迹于大学以获取额外“福利”。部分学生可能本身就达不到高校的学术能力要求，他们通过特殊通道入学并靠学术作弊来维持大学生身份，以获取额外利益。例如，在俄罗斯，通过体育特招方式入学的同学虽然有机会开启体育职业生涯，但往往难以兼顾学业。频繁出差参赛，使他们难以正常上课或完成作业。对于男生来说，混迹于大学的一个额外好处是免于兵役。即使在当下的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和乌克兰大学的学生都不会被征召入伍。

### 高校忽视甚至纵容学术诚信问题的原因

首先，教师在职业压力下的选择性忽视。随着教学在高校教师学术生涯中的地位下降，教师投入教育教学的时间和精力也日益减少。俄罗斯“5-100 计划”推动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尽管只有少数大学实质参与。在改革前，多数俄罗斯大学专注于教学和人才培养，而学术研究主要由科学院或工业界负责。许多大学教师的英语水平不足以支持高水平国际交流或学术研究。然而，现在他们每年需撰写学术论文，并在 Scopus 或 WoS 索引的国际期刊（尤其是顶级期刊）发表。在这些职业压力下，教师对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关注非常有限。

第二，大学筹资压力下的被动接受。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公立大学都根据特定年份的在校学生人数从国家获得经费，这一做法可追溯到苏联时期。这笔资金通常覆盖大学的主要支出，维持其正常运行。因此，维持稳

定的学生人数对大学至关重要。开除因学术不端或成绩不佳的学生，可能导致大学失去财政补助；从中长期来看，学校也会面临预算削减的风险。这将迫使大学裁减教职工，关闭项目或实验室。而私立大学则更加依赖学费维持运营。根据其商业模式，无论学生的学习成绩如何，它们都希望招收并留住学生。

第三，大学承载第三使命的客观要求。大学也并不仅仅关注在校学生人数。大学与政府共同承担着对年轻人的某种社会责任：确保学生在求学期间不失业，也不陷入不良社会环境。因此，大学要尽可能为这一群体提供充足的学习机会和有活力的学术环境。这也是世界各地大学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通过促进其所在社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知识和文化生活，为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服务。

第四，大众化时代为解决就业问题的客观要求。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约 80% 的 18 至 21 岁青年进入高校学习。在这两个国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职场中机会渺茫。因此，虽然并非所有学生都具备在大学接受高阶学习的能力和条件，但大学还是会为其提供毕业文凭，因为这是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的必要条件；很多学生追求的也仅仅是文凭，并不在

意如何获得文凭。

## 应对与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未来的所有措施、补救办法和改革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学术不端行为背后的复杂性（如上所述），更有效地针对这些问题；否则，任何努力都将毫无用处。研究发现，展示学术腐败的后果（如分享受害者经历）似乎是一个有效的治理工具。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向学生展示了一段受害者视频：一名通过贿赂和其他可疑手段获得医学学位的学生成为了一名不合格的医生；他在为一名婴儿接生时犯了错误，其后果是造成这个孩子终生残疾。这给学生们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促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当然，仅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上述研究强调，治理学生学术诚信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并依赖于社会整体的学术诚信制度建设和良好风气的引领。

注：有关学术诚信的更多讨论，请参阅《高等教育中的学术腐败：全球挑战与回应》（埃琳娜·德尼索娃—施密特主编；徐昭恒、王琪译，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 2024 年出版）。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副主编：王琪  
编辑：吴燕  
翻译：陈若曦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800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4458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s://soe.sjtu.edu.cn/Web/Content/76>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ociate Editor: Qi Wang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Translator: Ruoxi Chen  
Address: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4458  
Email: [jihe@sjtu.edu.cn](mailto:jihe@sjtu.edu.cn)  
<https://soe.sjtu.edu.cn/Web/Content/76>